

■ 经济学研究

# 承前启后: 北洋政府时期河南经济的新变化

## ——以农业、工业与市镇经济为中心

黄正林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北洋政府时期, 河南经济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农业方面, 不仅种植结构在改变, 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在提高。工业方面, 1920年代河南70%以上的工矿企业都兴建于北洋政府时期, 涉及工业门类在当时来说已经比较齐全, 经营方式有企业集团、股份公司, 也有中外合资企业, 现代河南工业布局在北洋政府时期已有雏形。手工业方面, 传统手工业少部分行业衰落了, 大部分还在延续; 因出口贸易的需要, 一些传统手工业如草帽辫、丝绸等行业有了较好的发展, 一些手工业转变为半机器生产, 手工业经营方式也在改变。市场变化最为剧烈, 以水运为纽带的传统市场比较迅速地瓦解了, 代之而起的是以铁路运输为纽带的新市场体系的形成。

**关键词:** 北洋政府; 河南经济; 农业; 工业; 市镇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58.2; F127.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3)03-0005-11

**收稿日期:** 2012-03-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重点项目(10JHQ008)

**作者简介:** 黄正林, 男, 甘肃环县人, 历史学博士,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问  
题, 学术界有很大的分歧。传统观点普遍认为, 自近代社会以来, 中国社会经济处于衰退状态, 即使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也持否定态度。如把出现的新式工厂和铁路看作是半殖民地化加深的表现, 把市镇、银行的繁荣看做是“畸形发展”, 认为随着外国工业品的输入, 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也完全破产。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近年来的研究从现代化视野出发, 通过实证研究, 在许多问题上都有深入的讨论, 尤其突破了近代史研究中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史”书写模式, 开始冷静思考近代中国不同阶段、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因此, 对北洋时期河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重新评估显得十分必要。

关于北洋时期河南经济史的研究, 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发表。如刘世永、解学东主编的《河南近代经济》涉及到北洋时期的经济问题<sup>[1]</sup>; 张瑞德的

《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一书也论述了平汉铁路对河南市场、农业、工矿业所带来的影响。<sup>[2]</sup> 沈松桥对1906年至1937年河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与农村经济做了研究, 认为随着铁路交通的出现、国内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增长, 以专业化与地域分工为特色, 为市场而生产的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在河南的农业经营中日见普及, 逐步加深了农业商品化程度。<sup>[3]</sup> 袁中金是大陆学界较早关注铁路与河南经济的学者, 认为铁路的兴修与市镇空间变化, 使河南经济成为一种“十”字型的“点轴”开发模式。<sup>[4]</sup> 岁有生等认为由于交通状况的改变而引起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新式工业的出现, 改变了当地居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生活状态, 也引起了当地经济结构的变化。王先明等人对铁路与华北市镇的研究也涉及到北洋时期河南一些市镇的兴起与衰落。刘晖认为铁路促进了沿线棉花生产区域化与商品化, 郑州的棉花转运、堆栈、打包诸业兴起, 使其

棉花贸易体系逐步形成<sup>①</sup>。上述成果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近代以来河南经济发展问题,但因研究方法、思考角度的不同,尚不能比较全面反映北洋时期河南经济发展的整体情形。因此,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北洋政府时期河南农业、工业与市镇经济方面出现的新变化进行整体考察,以回应近些年来热议的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題。

## 一、农业生产的新变化

北京政府时期,由于棉花、烟草和花生的种植,成为河南农业商品生产区域形成的主要时期。引起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形成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是新式交通的影响。在新式交通工具未兴起之前,农家经贸活动的半径较小,农产品的销售只能局限在区域小市场之中。如沈松侨所言“河南农民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大部分仅流通与农村附近的集镇市场圈,在性质上仍属于小农业生产者彼此间的互通有无。其真正进入长距离贸易网络,流向国内市场,至为有限。”<sup>[4]</sup>晚清至北洋政府时期,平汉、陇海铁路相继通车,不仅运输便利而且成本降低,使农产品交易突破传统的市场圈进入国内大市场甚至国际市场成为可能。河南区域市场与汉口、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和全国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使近代河南经济逐渐由封闭的传统经济向开放的外向型转变。<sup>[5]</sup>如安阳的棉花在铁道未通前,多半由小车、马车运销卫辉、怀庆一带,最远销售到黄河以南的开封、许昌等地。铁路通车后,棉花销售北达天津、石家庄,东到青岛、济南,南经郑州、汉口转销上海等地。<sup>[6]</sup>因此,新式交通的产生,对河南农业商品化生产区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市场的扩大,则促使河南经济发生结构性的转变,如棉花、烟草、花生等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是适应这种转型的结果。

新式交通的发生不仅仅使运输便利起来,而且也逐渐改变了居民的经营观念。在传统商业活动中,河南商人与晋商、徽商、陕商等商帮不同,在外地经商者较少。平汉铁路通车后,这种局面有所改变,河南商人有了长距离贩运意识,足迹遍及全国,如怀商足迹遍及省内市镇外,能到他省贩运;以运售绸缎为主的武安商人远足东北;南阳、镇平的绸商能自运销售汉口、长沙、上海各埠,直隶、东北也是其足迹所及之地。<sup>[7]</sup>经营观念的改变也体现在农民身上,如西平县居民以前外出经商者甚少,自平汉铁路通车后,农家的经营观念发生了变化,将农作物芝麻、小麦、黄豆及猪和竹木类运往漯河或汉口出售<sup>[8]</sup>。烟草、棉花、花生、芝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经营观念的改变,商品意识逐渐增强的结果。

二是政府的奖助。北洋政府时期对发展农业经济采取了多种奖助措施,包括设立农事试验场与推广植棉等,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sup>[9]</sup>为了扩大棉花

种植面积,北京政府农商部采取措施引进新的棉种,免费发给棉农种植。<sup>[10]</sup>1919年,河南省实业厅也规定了奖励植棉的政策,“凡增加本地棉田一亩,奖银二角,用美国棉种改良植棉者,奖三角”。实业厅还购买美国棉种,“发给各县农会,转给农人,年终由各县农会报告一次,择其增田最多,成绩最良者,再给以奖品或奖洋”<sup>[11]</sup>。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植棉政策尤其是引种美棉,民间对此反应十分积极。政府散发棉种,“农民请领者为数甚巨,其成绩之优以河洛道属为最,如孟津、渑池、陕县、阌乡等县,所有棉田概行改种,本地土棉几无形消失矣”<sup>[12]</sup>。安阳“自民国八年河南实业厅发放美棉种子,实业局设棉业试验场于南关,第二区大寒村白璧集亦先后组织棉公司就地实验,均获成效。”<sup>[6]</sup>另外,有的县政府也推广植棉,如杞县“石炳南知事竭力劝导,改种美棉,成绩颇佳,呈请当众核验,实大绒厚,并较土棉收获额超过三倍以上”。<sup>[13]</sup>在推广植棉方面政府与民众配合默契,不仅使河南的棉花产区不断扩大,也有助于改变学术界过去对北洋政府在经济政策上的认识与判断。

三是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烟草等经济作物在河南的推广则是另外一种模式,推广者主要依靠种植烟草较高的回报吸引农家“弃粮种烟”。1905年、1909年和1910年,英美烟公司就曾到河南邓州、确山、泌阳、南阳、通许等地进行调查,认为河南西南部生产的“烟叶色泽好,柄梗小,大部分体型轻柔,出筋梗后的产量为75—80%……有很多土地适宜于种植这类烟叶”<sup>[14]</sup>。1913年种植烟草在襄城获得成功,1915年,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襄城烟叶获奖<sup>[15]</sup>,使河南烟叶一举成名。英美烟公司看到了河南烟草巨大的潜力,就到“襄城、叶县去调查烟叶的生产状况,并且用较高的价钱收买了许多烟叶,作为农民种植烟叶的兴奋剂”<sup>[16]</sup>。为了引诱农民种烟,还“无偿散发烟种,预付高额烤烟收购定金,传授烤烟种植和栽培技术等办法鼓励农民种烟。同时,他们又通过无偿散发纸烟、提高烤烟收购价格等手段,使人获得了连想都不敢想的好处”。<sup>[15]</sup>这种有计划的暗示和高回报提高了农家种烟的积极性,烟田面积不断扩大,“不几年以许昌为中心的烟叶生产,便普遍到附近的十几县了”<sup>[16]</sup>。在许昌襄城途中,“田中植木横绳,束烟叶柄,排系绳上,曝于日中,遇雨则覆于席;遥视农家檐

① 岁有生、张雷《论道清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的影响》,《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王先明、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新兴市镇的发展(1905—1937)》,《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刘晖《铁路与近代郑州棉业的发展》,《史学月刊》2008年第7期。

下窗前,青黄累累者,皆烟叶也”<sup>[17]129</sup>。从烟草的例子看,高额利益回报是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的因素之一。

由于上述因素,北洋时期河南形成了以棉花、烟草、花生为主的经济作物种植区。

棉花产区。自1919年政府奖励植棉后,河南棉田面积迅速扩大。1920年,河南产棉区达40余县,产量“较去岁增加十五万余担”<sup>[11]</sup>。据1923年调查,全省植棉区域达到98县<sup>[12]1</sup>。又据地方志记载,河南“总计百十余县中,产棉者达九十县,而以河北之安阳为最”<sup>[18]卷4</sup>。河南的棉田从1919年以前的1300—1800千亩增加到1922年以后的2400—2800千亩。占全国棉田面积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如1919—1920年植棉亩数占全国的4.3%,1922—1923年提高到9.1%,1925—1927年提高到10%以上<sup>①</sup>。1920年代,河南出现了以棉作为主的农业区域,各县中棉田面积“以偃师为最广,共十二万五千八百六十亩;次为灵宝、阌乡二县,各十一万亩;再次汜水九万九千亩,陕州八万五千亩,新乡七万余亩,临漳、武安各六万余亩,阳武、浚池、原武、洛阳、获嘉、新安六县,各四万余亩,其余内黄、涉县、沁阳、辉县、修武、商水二十余县,数千亩至三万亩不等。”<sup>[11]</sup>又据1923年冬调查,植棉面积在1万亩以上的县43个县,占被调查县的43.9%。1920年的调查中植棉面积超过10万亩的只有3个县,1923年达到了12个县,即尉氏、太康、武安、新乡、洛阳、偃师、巩县、登封、灵宝、阌乡、临汝、新野<sup>[12]2-6</sup>,这些县份成为河南棉产的主要区域。棉花也成为影响植棉区域农村和市场变化的主要因素,如陕县“农产以棉花为大宗,而商业以棉业为基础,市面之繁荣与萧条,全视棉业之发达与否为衡”<sup>[19]卷13</sup>。

烟草产区。由于英美烟公司的大力倡导,使河南烟草种植范围不断扩张,1917—1920年,河南“种植面积猛增至10万多亩,烟叶上市量由1917年的250万磅上升到1920年的1433万磅。许昌开始成为英美烟公司的主要原料来源地之一。”<sup>[15]</sup>据有学者研究,1925—1935年,上海纸烟生产所用原料有20%来自许昌<sup>②[3]</sup>。邓县、西乡种植400余顷,年产烟叶500余万斤<sup>[20]90</sup>。禹县农家“几于无家不种,无种不多……小农至罄其田以种烟。”<sup>[21]卷7</sup>襄城“民国十年后,逐渐扩充遍及全县。”<sup>[22]卷18</sup>襄城、郟县“烟田连篇,炕房成群”<sup>[23]</sup>。到20世纪20年代,以许昌为中心,周边的襄城、禹州、郟县、长葛、鄆城、叶县、临颍等县地成为著名的烟草种植区,其面积、产量与质量,均居全国首位<sup>[24]7</sup>。

花生产区。河南种植花生历史比较悠久,但受运输条件和市场的限制,花生种植“仅供本地榨油及茶食之用,无贩运出口之利”<sup>[25]</sup>。民国以来,花生逐渐成为出口土货的大宗,种植面积扩大了,豫东原来不毛之地成为花生产区。“自郑州以东归德以西皆有之;惟开封附近一带,约三百英方里之面积,出

产为最多,中牟、开封、兰封三县,尤为特色……三数年前,商人之营运此业者,盈余甚厚,每致骤富。官府以此项交易既丰,亦随设局征收捐税,每年收入不下400万余元。”<sup>[10]207</sup>每年秋末花生收获季节,上海、汉口等处商人“纷纷来汴趸购。以去壳之花生米为输出大宗。新郑、薛店、谢庄、小李庄、郑州,皆花生米输出必经之路也。由新郑输出者,每年约九十余万斤。财政厅特设税局征收花生税,三县中兰封所产约居其半数也”<sup>[18]卷4</sup>。开封、中牟、兰封(与仪封合并为兰考)3县成为河南花生生产的主要基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河南花生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是:1914年为270000市亩和255000担,1915年为364000市亩和356000担,1916年为1390000市亩和1357000担,1924年至1929年平均为2119000市亩和5192000担<sup>[26]162</sup>。1924—1929年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分别比1914年增加了7.8与20.4倍。

北洋政府时期,美棉、烟草和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和推广,对河南农业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一,改变了河南传统的农作物种植结构。由于种植经济作物有比较丰厚的利润回报,因此农家在选择耕作时,将原来种植小麦、高粱、大豆等传统作物的耕地拿出来相当一部分种植棉花、烟和花生等经济作物,使小麦、高粱、大豆等传统农作物受到影响。如濮阳某村小麦“一九二〇年以前所占耕地面积约有二分之一以上,今则退为四分之一不足,其他谷类,亦由二分之一,降至四分之一。”<sup>[27]</sup>安阳“东南原隰之地,以前只种五谷者,今已为产棉上田矣。”<sup>[6]卷3</sup>因花生种植挤占的粮食耕地,开封有高粱、大豆和青豆,陈留有高粱、小麦和大豆,通许有小麦、豆类、高粱和小米,睢县有豆类、小米和高粱<sup>[10]213</sup>。据统计,睢县花生面积占耕地,1915年为15%,1920年和1924年占40%;陈留1915年占10%,1920年占20%,1924年占50%;开封1925年占31%<sup>[10]205-206</sup>。说明受利益的驱动,农家在种植安排上,把经济作物放到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种安排,使河南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第二,农家种植作物的目的发生了变化,农业商品化程度有较大的提高。卜凯对1921—1925年河南农村经济的调查,新郑农家粮食生产商品化占37.6%,开封占32.8%。两地各种农作物出售的比

① 根据许道夫的《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和沈颂侨的《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350页)相关数据计算。

② 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所言许昌烟叶,并非全部产于许昌,“实际许昌产烟有限,不过系一紧要之聚处耳,每岁合许昌、襄城、禹州、郟县四县所产烟叶”(南秉方《河南省产烟叶区之调查报告》,1934年6月油印本,第1页)。

例是:新郑小麦占28.6%,高粱占13.2%,谷子占10.9%,大麦占3.1%,玉蜀黍占14.2%,大豆占16.6%,绿豆占34.4%,豌豆占5.9%,黑豆占6.9%,芝麻占23.1%,蔬菜占58.3%;开封小麦占24.6%,高粱占24.1%,谷子占27.2%,大麦占24.8%,玉蜀黍占37.9%,大豆占13.7%,绿豆占26.6%,豌豆占36%,芝麻占92.7%,棉花占2.2%,大麻占1.1%,蔬菜占43.6%<sup>[28]275-278</sup>。在销售的农作物中,粮食所占比例较小,棉花、花生、蔬菜所占比例较高。再以花生为例,开封花生输出占50%—80%,陈留占77%,通许占50%,睢县占25%;销售到邻近地区的开封占5%—20%,陈留占20%,通许占50%,睢县占50%<sup>[10]232</sup>。两项合计,花生在开封、陈留、通许的商品化率在90%以上,睢县在75%以上。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与产量的提高,大部分作为商品在市场上销售。如南阳据地方志记载河南棉产“全省每年净棉产额约达八千万斤左右。除民间销用并供本省纱厂外,输出约达二千万斤。”<sup>[18]卷4</sup>全省棉花的输出率为25%,有的产棉重点地区高达70%以上<sup>[12]2-6</sup>。河南棉花不但形成了区域性规模种植,而且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

## 二、近代工业及布局的形成

河南近代工业肇始于清末,从甲午中日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有纺纱、机器、采矿、面粉等工业30家左右<sup>[1]18</sup>。在此基础上,北洋政府时期河南近代工业继续发展,新建了一批不同层次的近代工矿企业。据统计,全省有15个工业行业,140家企业,其中纺织业(包括织布、纺纱、丝织)11家,占7.8%;制蛋业30家,占21.4%;火柴业10家(包括改组后的),占7.1%;煤矿43家,占30.7%;面粉业13家,占9.3%;电业12家,占8.6%;机械5家,占3.6%;军工4家,占2.9%;其余打包业2家、烟草3家、印刷业3家、铁矿、医药、玻璃各1家,其他1家,占8.6%<sup>①</sup>。从工矿企业成立的时间来看,北洋政府时期河南工矿业主要建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两年,即1914—1920年成立工矿企业71家,占所有工矿企业的51.1%;1925—1926年,成立工矿企业26家,占18.7%。即在1920年代统计的企业中,有近70%的企业成立于北洋政府时期。

河南近代工矿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规模较大的企业。如豫丰纱厂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纺纱企业,1919年筹建,1920年投产。筹建时“占地九十八亩,建筑费二十五万,厂内可设锭子五万,织机一千二百架。”<sup>[29]</sup>建成后固定资产有美造电机4座,共3500KW,纱锭56448枚,织布机234台,国产紧线机5600锭,按装机先后顺序分为一、二、三、四、五个纺纱工厂和一个织布工厂,附设有发电厂1座和1个造纸厂;共有员工4170人,其中男工1270人,女工2900人,日产从棉纱120包<sup>[30]</sup>。该厂规模在当时全国也是比较大的。在工业发展过程中,为了

融资和形成规模生产,企业开始走联合经营的道路,组建企业集团,1915年组建的中原煤矿公司就是由中州、豫泰、明德3家公司联合起来的煤矿集团<sup>[31]324-327</sup>。1922年,该公司于盘龙河开掘大井,以新法开采,“规模乃日渐宏大”;资本也由原来的200万元增至400万元;生产规模达到年产煤55.8万余吨<sup>[17]244</sup>。这些企业逐渐形成了河南工业中的龙头,为纺织、煤炭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现代企业制度在近代河南企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公司制度是晚清时期引入中国,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进一步推动了公司制度的完善。民国初年河南建立的一些工矿企业也采取了公司制度。如华新纺织厂由周学熙等人创办,1915年筹建,1916年获得农商部批准华新纺织股份公司正式成立,股本为银币1000万元,其中四成由政府拨款(为官股),六成为商人集资(为商股)。股份以银币100元为1股,共计10万股,以最先收入之商股300万元为优先股,每10股加红股1股,其余为普通股,均自交款之次日计息,所有股份正利均常年8厘。<sup>[32]</sup>豫丰和记纱厂,由著名实业家穆藕初集资创办,初有纱锭51400余枚,1926年添5000枚,织布机201台,规定原资本为300万两,分作6万股,每股银50两。<sup>[33]</sup>另外,新华纺织厂<sup>[34]</sup>、开封宏豫铁矿公司、中原公司等均属股份制企业<sup>[35]</sup>。股份制的引入是河南近代企业制度的一大变革。

河南还出现了中外合资的企业。1919年,日商与华商合资开办了新乡通丰机器面粉公司,资本额为100万元,有大小引擎4部,共355马力,各种机械69台,男女职工230名,日产面粉5000袋<sup>[1]24</sup>,是当时河南省最大的面粉企业。1915年,通过谈判,英福公司与中原公司合资建立了福中公司,也是一个合资企业。

北京政府时期,随着工矿业的兴起,河南铁路沿线还出现了一些新兴工业城市。据统计北洋时期工矿分布在安阳19家,新乡18家,开封16家,郑县13家,许昌7家,洛阳7家,汤阴6家,漯河6家,巩县5家,修武4家,陕县4家。<sup>②</sup>成为河南近代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郑州本是豫中一普通小县,两铁路兴建后显示出了其巨大的区位优势,到1920年

① 据王天奖《清末至民国年间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河南文史资料》2001年第3辑,第173—188页)、徐有礼、程淑英《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河南工矿企业资料》(《河南文史资料》2002年第2辑,第4—19页)有关统计计算。

② 根据徐有礼、程淑英的《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河南工矿企业资料》(《河南文史资料》2002年第2辑,总第74辑,第4—19页)与王天奖的《清末至民国年间河南民族资本主义工矿企业》(《河南文史资料》2001年第3辑,总第79辑,第173—188页)统计。

代,郑州已经发展成为河南工业、金融和商业中心,逐渐兴建了纺纱、机械、火柴、面粉、电业、打包等工业企业,成为河南新兴的工业城市。安阳在晚清和北洋时期,建有豫新纺纱股份有限公司、孚惠织布广场、华丰织布工厂、元丰蛋业公司、大和恒面粉公司、德瑞兴小磨面厂、中兴电灯有限公司、万民织工厂等<sup>[6]卷7</sup>,发展成为豫北一工业中心。新乡不仅是煤的集散地,还设立了一些近代工矿企业。“车站旁之煤栈商人,凡四十余家,由福中公司运来,于此分发。祥记公司资本二万元,规模较大;宏豫铁矿公司,资本四十万元,最为雄厚;通丰机械面粉公司,资本五万元;新华火柴公司,资本六万元;蛋厂五家,资本皆五万元以上”<sup>[20]200</sup>,新乡成为当时河南工业发展最快的一个县城。焦作原为修武县西部一个偏僻的村庄,自英福公司在焦作开设煤矿和道清铁路建成通车后,“地利开发,交通便利,工商发达,与时俱进,俨然为豫省西北之重镇”<sup>[36]74</sup>。1927年以前,焦作已经拥有矿工5000人,以车站为中心形成了福中街、马市街、中原街等多条街道,服务于煤炭工业的第三产业如旅馆、饮食、金融等行业同时兴起<sup>[37]</sup>,奠定了焦作成为河南煤炭工业城市的基础。洛阳古城也成为拥有机械、食品、煤炭、电业、纺织、火柴等行业的工业城市。平汉、陇海、道清三条铁路沿线工业城市的兴起,说明北洋时期河南近代工业格局已经有了雏形。

### 三、手工业及其新变化

传统观念认为,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使河南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退却,显著地加快了自己的解体过程。这不能不使河南的手工业受到破坏性影响”<sup>[1]24</sup>。但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北洋时期河南手工业的所呈现的状态完全不是这样的情形,手工业呈现出多种变化趋势。

(一) 传统手工业普遍保持了较强的生命力,部分还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河南各地传统手工业有棉织、丝绸、瓷器、竹器、漆器、编织、皮革、农具、日用品、酿造以及农产品加工等。如新乡手工业产品有白布、汴绸、麻头纸、毡帽、熏枣、麦糖等,白布主要产于西南小冀镇,该镇有布行数家,产品主要行销山西;该县西南以生产毡帽为主,行销河南各地;熏枣产量较多,畅销河南、汉口、江西、上海等地;<sup>[38]卷2</sup>许昌各集镇都有自己特色的手工业,尚集的毡帽,沙埠口的猪皮纸,采店的石固,水潮店的发网,杜寨的席,石固的棉布,繁城的辫蒂,漯河保的毛笔、土城保的窑器,“皆工业卓著者”;<sup>[39]卷6</sup>洛宁的手工业主要是农副产品加工业,有麻油、麻绳、竹器等;<sup>[20]244</sup>淮阳编织业比较发达,“城外南北各乡间有织蒲席、编蒲包、编草席、编蒲扇以为生活者”;<sup>[20]148</sup>安阳出粗瓷,“各家土窑,制成粗具,售之直晋,岁获四五十万元”;<sup>[20]186</sup>郟县手工业以石槽为大宗;<sup>[20]262</sup>汝南的手

工业以制铁和粮食加工为主,1912年,全县有铁匠60户,从业人员220余人;铸造业8户,从业人员130余人;粮油加工作坊49户,从业人员216人;<sup>[40]412</sup>新野以榨油业著称;<sup>[20]286</sup>黄河北岸沁阳县许良镇盛产竹子,竹编是农家最具特色的手工业,产品有桌、椅、花篮等陈设品以及各种器皿,“由道清铁路东运,销行甚广”;武陟农家在棉花收获后,“捻以为线,染成五色,用制各种花毯,或以蓝、白二色相间织做被囊、衣包等,销行颇广”;<sup>[18]卷4</sup>项城“近来乡间种棉花较多于昔,其利固薄,然妇女纺织为布,以便民用”;<sup>[41]卷5</sup>柘城以“乡间居民皆能纺织,因而出布特盛”;<sup>[20]146</sup>鄢陵手工业“以布匹为大宗”<sup>[42]卷13</sup>。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北洋政府时期河南各地手工业呈现出比较顽强的生命力,乡村大部分手工业不但没有消失,而且保持了原有的地方特色,甚至成为本县乡村经济的支柱产业。显然,这种局面并非以前人们所说的农村手工业是一种完全破产的景象。

在各种传统手工业中,草帽辫、丝织业在北洋时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河南为小麦产区,秸秆丰富,于是地方政府积极开办帽辫传习所,教授农家妇女学习草帽辫编制工艺<sup>①</sup>。通过地方政府提倡,草帽辫成为乡村手工业新的增长点。草帽辫以荥阳、鹿邑、西平、新野、潢川等县出产较多,“荥阳花纹精细,岁得二万斤,商人设庄收买,运送出口。鹿邑所出,色泽尤鲜,洋商贩运上海出口,岁得七八十万斤。新野所制草帽,行销湖北沙市等处,岁可得七八万顶。西平所制岁亦二万余斤,草帽亦岁有三万顶,行销汉口、周口等处。潢川所出草帽,岁可二三万顶,运销汉口、上海”<sup>[43]</sup>。又据《河南新志》记载“荥阳、荥泽二县均产草帽辫。夏日二麦收割以后,柳阴茅屋之前,妇女三五,或守场圃,或相谈笑,辄手持麦秆,编制不辍,男女无不善此。甚至行路或观剧之顷,亦手不停编;盖久则习熟,心手相应,归于自然,无须特意经营也。草辫成后,或制草帽及玩物售卖,或原辫出售,每年全境产额约万数千斤,大抵由郾城、荥泽及黄河南站运至汉口、上海,以输出国外……又豫东鹿邑县亦草帽辫之出产地,所制光泽细致,过于荥阳,每岁约产七八万斤,由洋商采买,输出国外。”<sup>[18]卷4</sup>据20世纪20年代统计,荥阳有草辫、草帽业工厂11家,分布在须水城、二十铺、赵村、祥营镇、汪沟和县城等市镇,资本总额达2.8万元,年产

① 如温县绅董、傅元勋等创立中区、东区女子草辫传习所《温县请设女子帽辫所》,《新中州日报》1918年1月17日)登封县知事特邀绅士集议,设立草辫传习所,召集女生40名,延请荥阳女工充当管理教员,“教以劈草细辫,务期逐渐改良,不独养成妇女工作之习惯,亦振兴实业之一端”(《登封改良草帽辫》,《新中州日报》1918年6月3日)。杞县、兰封、郑县、汜水等县,“亦多设立草辫传习所,提倡此业,成效颇著”(《河南草帽辫出产尤多》,上海《国民日报》1919年8月15日)。

22.7 万顶,包括双鹿、双龙、双喜、双凤、仙鹤、寿星、飞艇 8 个注册商标<sup>[44] 卷1</sup>。荥泽乡村草辫十分普遍,达到了行路、纳凉、闲聊以至行走“常手不停编”的程度<sup>[17] 209</sup>。鄆城“无论乡村集市,老妇少女皆以编草帽辫为业。以麦秸极贱之物,编成辫即可售卖。每斤粗者数十钱,细者百余钱。勤而速者,终岁所得值自给衣服且有赢也。”<sup>[45] 卷5</sup>受鄆城等地影响,项城乡村也兴起了草帽辫的生产,“近见鄆城一带无论乡村集市,老妇少女皆以编草帽辫为业……编成辫即可售卖,每斤粗者数十钱,细者百余钱”<sup>[46] 卷5</sup>。因出口量增加,草编在上述各县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草辫是中国旧有的手工业,近代以来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河南各地的草帽辫业在这个时期有比较快的发展,成为北洋时期河南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丝织业在北洋时期也得到了发展。伏牛山以南各县如南召、鲁山、镇平、南阳、内乡、淅川、方城、伊阳、临汝、密县、泌阳、确山、商城等县居民,在“山中陂陀瘠地遍植柞,其树丛生,高不过数尺,用以饲山蚕,名曰蚕坡”<sup>[18] 卷4</sup>。有此生态条件,生产丝绸为这些地方的主要手工业。南阳早在“清代中叶,居民仿制汴绸、春绸,行销邻省,由来已久。同治时,知县殷汝璧竭力劝导各机工改良制品,不数年,顿改旧观,出货渐旺,当时有殷缎之称。”<sup>[18] 卷4</sup>北洋时期随着丝绸出口量的增加,刺激了豫西南各地丝织业的发展。如密县“民间养山蚕,取丝织就。较鲁山绸略见纯熟,价亦较昂,外人有以作西服者。”<sup>[20] 125</sup>柘城丝厂城市、集镇“皆有之,因而出丝尤夥,每年由德元、协广、昇顺等各丝行运售于外境之丝,价值约二十万元”<sup>[20] 146</sup>。南召“养蚕之家居十六七,能自制丝,无特别工厂,丝绸商号以李青店为最,次留山,次白土岗。商号之大者,有男女工二百余名。家丝本地可销,山绸之大销场则为恰克图及上海。”<sup>[20] 272</sup>又据 1921 年统计,南召全县年产丝 20 余万公斤,占全省的 30.09%。有机坊近 3 000 家,织绸机 4 550 张,年产量达 20 201 米<sup>[47] 31</sup>。1920 年以前,南阳“城关织绸机三百余家,山绸工厂数十家”<sup>[20] 270</sup>。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发展到约 700 余家,大小织机约 3 000 余台,每日可产绸约 1 000 余匹,价值 1.7 万余银元;每年约出货 400 万匹,价值 600 万银元<sup>[17] 140, [7] 卷7</sup>。据调查,镇平“大小机不下数千五百具”;<sup>[48]</sup>该县是石佛染色集中的地方,南阳丝绸“大半染于是镇”。此外,南召“出丝颇盛,居民多织造小绸”;鲁山以产鲁山绸著名,“产额盛多”<sup>[7] 卷7</sup>。丝织业在豫西南的农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镇平石佛寺“附近村民几于家家有机,人民赖以谋生无殊农田。”<sup>[18] 卷4</sup>1920 年代,河南柞蚕业颇为兴盛,年产茧约达 30 万亿粒,产丝 200 万斤,产绸 25 万多匹,经上海输出,价值白银年达 500 余万海关两(每两合白银 3 市两 2 钱),占全国蚕丝的 65%。全区养蚕户数在 10 万户左右,机织达 3 万余家。柞蚕丝收入占农家全年收入的 40% 以上<sup>[49]</sup>。

(二) 在西方机制商品的冲击下,那些能够被“洋货”与机器工业品可替代的手工业开始衰落。尤其铜匠业、土碱、土布、土印染等行业衰落比较快。因洋瓷与铁器皿的输入,传统的铜盆、铜壶使用越来越少,项城的铜器制造业大部分歇业了<sup>[20] 166</sup>。濮阳县某村原来以生产土碱为农家主要副业,曾经是“碱场星罗棋布”。1920 年后,“因洋碱侵入,价廉而质纯,用土碱者已去其大半”<sup>[27]</sup>。农村土布业受打击最为严重,正阳“陡沟附近居民,家尽设机,人精纺织,纱细布密,畅行颍、亳及山陕二省。商贩极多,每早晨布市,张灯交易,备极繁盛。寒冻织绌亦佳,故寒绌陡布一致著名。近受洋货侵略,衰替殆尽”<sup>[50] 卷2</sup>。洛阳的土布业“自从洋布进入市场,土布无力竞争,广大农民多数停纺断机……所剩无几。”<sup>[51]</sup>土布业的衰退,也引起了印染业的不景气。如临颖的织布业历史悠久,同时染坊也很多,但随着洋红、洋绿、煮黑、煮蓝等的进口,逐渐代替了传统染坊所用的靛蓝,“农村的‘打靛池’也变成了废物”<sup>[52]</sup>。新乡北乡一带农家也以种植蓝靛为生,但“自洋靛充斥,种者日少”<sup>[53] 卷2</sup>。安阳水冶、阜城一带以前种植蓝靛较多,“种植者彼获厚利”,但近代以来“洋靛多自舶来,土产原料无人改良制造”,种蓝“逐日见其少”<sup>[6] 卷3</sup>。麻布也开始减产,信阳“清季已无织工,所产之麻运销湘、赣,民国后并所产岁减矣”<sup>[54] 卷11</sup>。武陟县原来生产的雪花手巾,“自秘其术,又不能改良,今则为毛巾所兼并”<sup>[55] 卷6</sup>。土碱、土布、蓝靛、麻布等是北洋政府时期河南农村衰落比较快的手工业。

(三) 部分手工业生产转向半机器生产。纺织业中,一些家庭纺织业开始购置机器,从事半机器生产。如鄆陵纺织业在民国初年“有个人备置纺纱织布等机器百余户,出品颇佳,尚堪供世用。”<sup>[20] 118</sup>偃师“全县有布店十余家,普通社会人多以纺织为生,惜乎尽属土法,未能改良。近来有在外购买纺纱新机,暂行试办,未著成效。”<sup>[20] 118</sup>汜水纺织业为家庭副业,北洋时期“始有倡用铁机者,男女合作,每机每日可出布三四匹”。铁机的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汜邑家庭工业或女作,或本土法,或改新式,无不蒸蒸日上”,一些家庭工业的生产技术也在不断改进,“近来购置机器织洋袜、围脖、绒帽,东关及四乡多由家庭自办”<sup>[56] 卷7</sup>。新乡、禹县的制瓷器业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神垕镇是钧瓷产地,建立了瓷业公司,“资本五万两,用新法制造”<sup>[20] 124</sup>。武安出产以煤为大宗,原“系土法开挖”,民国初年开始以股份制组织开采,向机械生产转变,“近年绅商集股,购机领照,争先开采者约六家”<sup>[20] 196</sup>。荥阳的草帽辫业“自开办传习所以来,改用机器,出品精美不亚于山东、直隶。”<sup>[44] 卷4</sup>这些变化反映了民国以来河南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不断改进,转向机器生产无疑推动了河南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乡村手工业。

(四) 出现了一些新兴手工业行业。北洋时期,河南新兴的手工业主要是扎花、手工卷烟等行业。随着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轧花成为一种新兴的手工业,如修武设“轧花厂五十余处”<sup>[20]226</sup>。太康是豫东棉花主要产地,轧花业“近来逐渐发达,轧房收买籽棉,轧作皮棉,转售于商贩,颇获厚利”<sup>[57]卷3</sup>。河南许昌种烟的农民,在最初种植时,收获后即将烟叶出卖于商人,农民并不加工烟叶。随着卷烟业在河南兴起,农民除了出售烟叶外,“并在自己家内制造烟丝,有时并卷成烟卷再行出卖;不久专门制造烟卷的手工作坊,即在许昌及许昌周围各县建立起来,现在许昌及许昌附近十九县制造烟卷的家庭工业及手工作坊已达六百处以上”<sup>[10]241</sup>。这些新兴的手工业行业,也成为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

(五) 手工业的经营方式有了新的变化。近代以来,家庭手工业与市场结合日益紧密,传统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的需要,因此,在一些行业出现了类似包买商的经营方式。在中国的手工业经营中,包买商出现得比较早,如河北高阳的织布业经营方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商人雇主制度”,学者多有论述。但尚未有学者关注河南卷烟业手工业的“商人雇主制”。在许昌卷烟生产的初期,农民在自己家内制造烟丝及烟卷,然后再出卖于商人。但随着卷烟手工业与市场发育的成熟,商人开始介入生产阶段,即商人“开始供给农民以卷烟的纸,规定卷烟的样式、牌号及品质的标准,以至规定卷烟的价格、生产数量及交货的日期,最后[烟]丝亦由商人供给,对卷烟者支付工资,并将卷烟工作的一部分,如装璜、包装等则在自己厂内完成”<sup>[58]</sup>。许昌卷烟生产过程中,商人参与到手工业生产领域的某个环节或全部环节,商业资本在手工业生产中已居于支配地位。土布、丝织业也有“商人雇主制”,禹县土布生产“初用本线,近年亦用洋线……凡贸布者,皆与城内洋线庄交易,上市受线,下市交布,不费现本,亦无赊债。此农家合宜之业也。禹布肇起于酸枣树杨,今则南抵邾界,北渡颍流,轧轧机杼声闻数十里,分之则家给人足,合之而一市万贯”<sup>[59]卷7</sup>。镇平石佛寺丝织业生产采取“包机”,即由丝庄供给原丝,出工钱,定规格,定成品的交货时间,由家庭内工业去完成的一种生产方式,常年织包机的人家被称之为机户。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以前,镇平县当时有机户1.5万余家,石佛寺镇每逢集日,发出的包机工银常在1万元银币以上<sup>[60]</sup>。商人资本参与手工业生产,是近代河南手工业经营中一个新的变化,说明家庭手工业经营已经突破传统的模式,走上市场化经营的道路。

## 四、市镇兴衰与市场空间的变化

河南传统市场是以水路为物流的主要方式,以河流为纽带形成了以四大名镇——周家口、朱仙镇、赊旗镇、道口镇——为系统的市场网络。随着铁路

的兴起,运输路线与商路的变化,以四大市镇为体系的传统市场逐渐衰落。

周家口位于贾鲁河、沙河汇合处,由三寨组成,其南寨属商水县,北寨属淮阳县,西寨属西华县。沙河、贾鲁河是支撑周家口镇繁荣的两条水系。沙河“上游经逍遥集邓城至漯河,计水程一百五十里,民船约一昼夜可达,水涨时年有数月亦可通小轮。漯河系京汉铁路与沙河交汇之地,为周镇出入之咽喉;下游至水寨六十里,至槐店九十里,至界首一百六十里,入皖境太和二百二十里,至阜阳(即颍川)二百八十里,至正阳关四百六十里。正阳关亦豫皖商货出入必由之路,沙河至此注入淮河,通达镇江等处,在昔运输均恃以为枢纽。”<sup>[7]卷3</sup>贾鲁河是支撑周家口镇的河流之一,自荥泽向南,经朱仙镇、扶沟至周家口镇之西寨、北寨注入沙河。正是这两条河流构成了周家口镇的运输系统,也造就了以周家口镇为中心的市场体系,清时期形成著名转运市场,清代中期达到鼎盛<sup>[61]</sup>,是河南农副产品出口的第一大市场。但“自京汉铁路成于西,津浦铁路成于东,陇海铁路贯通于北,由是商务他移,市况日益萧条,茶叶贸易十减八九,观夫茉莉园之存者,今不一二处,可见一斑矣。”<sup>[17]201-202</sup>原来运输到周家口的货物经由平汉铁路运至汉口,周家口市场的传统腹地转变为汉口的市场腹地。<sup>[2]65</sup>20世纪20年代,周口镇已失去其转运市场的地位,日渐衰落了。

朱仙镇位于贾鲁河上游,与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与湖北的汉口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镇。朱仙镇因泛舟贾鲁河,与周家口水运系统相连,使其在清朝康熙、雍正时期初具规模,乾隆年间商业进入鼎盛时期,商人商号数量超过千家。<sup>[62]</sup>朱仙镇在平汉铁路兴建之前因黄河水患已经开始衰落,“自光绪年间,郑工合拢后,贾鲁河下游淤塞,水运不通,该镇商务日形凋落”<sup>[63]</sup>。平汉与陇海铁路通车后,加剧了朱仙镇的衰落,据《河南省志》记载“在铁路未通以前,此地为开封运输孔道,贾鲁河纵贯镇中,可南达周家口,舟楫林立,百货云集,为全县商业最盛之区。今铁路建设,此镇失其效用,日就衰微矣!”<sup>[7]卷2</sup>贾鲁河的淤塞与平汉、陇海铁路的兴建,使朱仙镇彻底失去了集散市场的地位。

豫西南的赊旗镇位于赵河与潘河交汇处,其下游为唐河,在湖北襄樊入汉水,直抵汉口。由于水运条件便利,赊旗镇在康熙时期就形成集市,在清朝中叶达到鼎盛,是豫西南粮食、花粉、食盐、茶叶、杂货、布匹、中药材等商品的集散地。<sup>[64]</sup>但清末民初开始走向衰落,一是唐河水量逐渐减小,影响了大型货船往来,致使货物运量下降;二是京汉铁路的建成通车,赊旗镇距离铁路较远,运输日渐不便,“失去了昔日的繁荣昌盛景象”<sup>[65]281-282</sup>。

卫河是华北平原上的一条重要水上运输通道,维系着华北与天津的市场关系,道口镇因此而成为豫北商业重镇。该镇“西邻卫河,旧日帆船往来如



织,大船多停泊于此。长芦盐至此,或由小舟运往西南诸县,或由马车运至陈桥驿,转输黄河以南;小麦、杂粮之运往天津者亦由此集散。水陆交通,商务甚盛。”<sup>[17]231-232</sup>时人在论及铁路对水运产生影响时曾说“河北舟楫便利首推卫河,道口镇之所由繁盛也。自京汉路成,长芦盐漕运已尽改道,船只由五千减去千余,且多窳败,道口商务顿形衰落。”<sup>[7]卷7</sup>京汉铁路通车后,卫河水运受到巨大影响,道口商业随之失去豫北集散市场的霸主地位。尽管道清铁路修建后,道口商业因煤运而有起色,但仍难恢复旧日盛况。

随着传统市场体系中大市场的衰落,依托于这些市场的“次中心市场”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武陟县的木乐店因交通方便成为豫北传统集散市场,清代中期这里“百货屯集,而邑人之由商起家,集资巨万者,颇不乏人”。但近代以来,“沁流淤垫,黄河商船不能上驶,水埠遂移于赵庄,商务乃大减色,迄于广宣、道清、京汉两路相继告成,山西之南行、川陕之北上,皆改而之他,商务遂替落无余矣。虽黄河北岸新立车站,其货之运往怀属各邑者,仍以此处为枢纽,而较诸昔日盛时殆不及十之一二”<sup>[55]卷6</sup>。宜阳县的韩城镇,位于洛水北岸,曾经是潞盐集散地,商务颇盛,因陇海铁路延展,“盐运改道,商务骤衰”<sup>[17]109</sup>。信阳县长台关是淮盐在河南行销的集散地,平汉铁路在其西边通车后,潞盐南消,淮盐被阻,市场日益萧条。<sup>[2]66</sup>随着铁路的延伸,因铁路而兴起的市场也在变化,如渑池县城,1914年陇海铁路西展到渑池时,扩大了商品流通领域,火柴、煤油、肥皂、卷烟等物品大都通过渑池向省内各市场转销。开封的天丰、益丰两面粉公司通过城内同德粮行代购小麦,每天外运一二万斤,陕晋及豫西的棉花业由渑池向外转运,县城出现了5家较大的棉花行和一些京货店。渑池县城成为豫西的一个中转市场。但是,随着铁路的继续西展,1923年陕县通车后,陕县取代了渑池的商业地位,“外地货物不再集中渑池转运……商业一度呈现萧条”<sup>[66]</sup>。可见,随着新式交通体系的建立和物流方式的改变,一些市镇却失去了往日的优势区位,逐渐萧条了。

在传统市场体系衰退的过程中,随着新式运输方式的建立,以铁路为枢纽构建了新的市场系统。一些小县一跃成为商业都市,一些小镇或村庄成为著名市镇和工业城市,郑州、驻马店、漯河是其中的典型,在北洋政府时期已经确立集散市场的地位,一些铁路穿越的古老城市,市场地位也凸现出来。

郑州是平汉、陇海铁路交会之处,是典型的因铁路而新兴的商业都市。郑州在通车前,“是一个街道狭窄,道路弯曲,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类似18世纪古城镇式的小集市”<sup>[67]</sup>。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通车后,在城外开辟了新市场,位置在“车站之侧,廛区规划,颇为整齐”<sup>[68]</sup>,1920年时,“昔年户数五百,人口三千三百”的小镇,“骤增万人,东西街最繁盛,西

门外为车站所在,旅店、菜楼、剧场、澡堂,市上人力车,亦百余辆之多”<sup>[20]172</sup>,一个新郑州诞生了。随着河南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各地棉花(主要是豫西、陕西所产)先由商贩集中在郑州,“再行分运南北”<sup>[17]72</sup>。为了适应棉花交易与运输,先后成立了10余家花行和10余家堆栈。<sup>[69]</sup>1916年郑州花行同业会成立,推动了棉花市场的形成和发展。通过郑州输出的棉花量从1919年的35万担,增加到1923年的30余万包(每包约重180斤),1924年为50余万包。<sup>[70]</sup>在1920年代,郑州逐渐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内陆棉花交易市场<sup>[71]8</sup>。郑州棉花交易市场的形成,也带动了一系列行业的发展。郑州市场的繁荣,引起了金融界人士对郑州的关注,“认为郑州是个新码头,很有发展前途,金融界在这里大有作为,于是银钱业很快发展起来”<sup>[72]</sup>。这期间,在郑州的新式银行有6家<sup>[73]</sup>。旧式金融银钱业也有所发展,同和裕银号(1915年)、源和盛银号(1916年)、信昌银号(1920年)、厚生银号(1923年)等4家大银号在郑州建立。<sup>[74]</sup>在西关车站以东地方,逐渐成为郑州最繁华的商业区,比较繁盛的街市有大通路、钱塘里、敦睦里、天中里、三多里、福寿街,“皆在车站之东”。郑州成为河南新兴的商业都市,对其未来发展趋势,时人评价说“郑县土地平坦,地位适中,向为东西南北交通之要冲,加以铁道交贯,交通益形迅捷……将来交通日盛,商业范围愈大,而贸易之额愈增,前途发展益未可限量矣。”<sup>[17]72-74</sup>郑州后来的发展印证了时人的预言。

驻马店原属确山县,“旧为遂、平明港驿马驻所”<sup>[75]</sup>。平汉铁路通车后,确山境内“铁道车站有六:最大者曰驻马店,东通汝、颍、淮、蔡,西及唐、邓、宛、叶,百物辐辏,万商云屯”<sup>[76]卷15</sup>。驻马店有较好的区位优势,“东通汝南,西通唐河、南阳、汉口,北来之货,豫南输出之货,多集散于此”<sup>[17]170</sup>。工商业者在这里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投资与建设,商栈、工厂、政府机构逐渐建立起来,街道也开始拓展,如地方志记载“争购地基,建筑房屋,街道齐布,商业云集,陆陈盐厂荟萃于此,并设警察所以资保护,南北往来商旅称便。”<sup>[76]卷13</sup>其商业繁盛程度很快超越了周围县城,“虽数百年资格之府城、县城亦不足比其繁盛,或转而仰给焉。汉口小本商人捷足先至,遂垄断一切”<sup>[20]306</sup>。驻马店的“市场腹地达到二三百里,汝南、沁阳等地农副产品集中在这里运销外地,外面的食盐、煤炭、布匹、砂糖、粗纸等也从这里流向周边地区”<sup>[75]</sup>。这个“昔日小店,遂成小镇”<sup>[20]306</sup>。驻马店从一乡村小镇逐渐转变成为平汉铁路沿线的集散市场。

漯河本系郾城县的小镇,原名漯湾河镇,简称漯河,位于沙河、沔河交汇处,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开始繁荣起来。“汉口北来之货,多于此销行本省南部各地;而土产之芝麻、黄豆、鸡蛋、牛羊皮、茧绸等亦由此输出。”<sup>[17]167</sup>也有一些农庄从周家口



镇、汉口迁移到漯河,据《鄆城县记》载“近由汉口移来方恒正等行栈多家,或自称洋行堆栈,或自称华洋公司……买卖土货洋货,并代客包运货物,承揽车船。”这个小镇很快超过了县城<sup>[7]卷4</sup>。为了满足商家需要,银钱业开始兴盛起来,1918年统计,已有钱庄、银号10多家<sup>[77]</sup>。同时,漯河逐渐替代周口成为巨大的牲畜集散市场。1921年英商安子钦到漯河从事牲畜交易,他在漯河3年,“每日平均收磅牛50头,收购的牛由漯河火车站装车押运天津,由天津乘船运往国外”。漯河牲畜市场与国际市场有了紧密的联系,1923年,组织成立了牲畜同业公会——马王会,主要“组织处理牛行业的日常事务与纠纷”<sup>[78]</sup>。这些都说明20世纪20年代漯河已经成为豫中比较繁荣的商业中心了。

北洋政府时期,铁路沿线一些古老城市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新的市场活力。省会开封区位优势虽不及郑州,但作为河南省会,商业都市的地位还在,“商务之盛,甲于全省”。据记载:马道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等处原来均为荒寂之区,到20世纪20年代已是康衢大道,成为闹市;马道街、鼓楼街、土街、书店街、东大街、西大街、河道街、徐府街、南大门街,马路宽直,是开封商业比较集中之地。北洋时期的开封市场,一方面,延续了古老的商业传统,如粮行主要在东门及南门内,牲畜交易主要在宋门及南门瓮城内,绸缎布匹、广洋杂货在马道街、鼓楼街和土街,书籍、纸墨、文具等分布在北书店街,古玩、书画多在土街及南书店街,箱柜在河道街,旧衣店多在徐府街,旧式杂器在老府门街等,这种布局沿袭了传统市场格局。另一方面,新式购物商场在开封也出现了,开封第一家新式购物商场出现在清末,即位于新华南街的“开封第一商场”,属于商人筹资所建;1919年省实业厅筹集款项,在新华南街建立了“河南全省劝业场”,是一所公立商场,有绸缎、布匹、时货、鞋帽等商店和照相馆。在中山市场大街建立了“中山市场”,内设平民公园、演讲室、游艺室、图书室、纪念室、美术馆、实业馆,并有各种商店<sup>[18]卷5</sup>,是集休闲、购物、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商业中心。购物商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购物习惯,使购物被赋予了游玩、观光、欣赏等新的意义,古老的城市有了现代文明的曙光。

洛阳位于豫陕晋交界处,地处中原进入关中的交通要道上,近代以来,随着“洋货”的输入和地方手工业的衰退,洛阳也出现了衰落的迹象。但北京政府时期,随着豫西棉花的种植和铁路的修建,洛阳又逐渐繁华起来,人口增加到5.4万人,“商业繁盛,肆市比栉,东街新修商场,规模宏大”<sup>[20]230</sup>。位于市内的关帝庙改建为新式商场,南大街、西大街、北大街以商场为中枢,“场内地址宽阔,商贩麇集,游人络绎,犹汴之相国寺”,洛阳南门附近是土产、棉花等批发转运市场<sup>[17]83</sup>。一些外地商号也相继在洛阳设庄开行,如北京“福来祥”百货店、浙江“宝成”

金店、山东“谦信”染料行先后在洛阳落户。有的商店一改过去木板门,装修为新式门,如“泉茂”、“正兴”茶庄包装精美;有的传统食行如“四茂恒”、“长春”、“字裕长”等酱菜、糕点铺开始摆出各色糕点、糖果、饮料,“变为新型的南货食品商店”<sup>[79]</sup>。金融业也繁荣起来,据1915年统计,洛阳有10家银号<sup>[80]598-599</sup>,1921年,洛阳新开设了10家银号<sup>[81]336</sup>,主要从事存款、放款、汇兑与铸造元宝等业务。

许昌“自铁路交通,许昌商业日形起色”,以火车站为中心,各种工厂、公司相继设立,盐厂、猪厂、蛋厂、煤炭、煤油转运各公司,城内有中国银行、河南银行、丝绸庄、钱、纱庄、洋货庄、皮庄、香油庄、杂货庄等业“均较前发达”<sup>[82]卷6</sup>。西关是著名的烟草市场,英美烟公司、南阳兄弟烟公司在许昌商行收购烟草,全国各地烟商亦纷至沓来,随之烟行、转运公司兴起。每至秋季烟叶收获后,“乡人来此求售,异常繁闹。公司收买烟叶,加以烘焙,包装运往沪、汉”,每年经许昌车站运出烟叶200余车。许昌也是豫中的农产品集散地,每年经车站运出的许昌产的各种农作物3270余吨,红薯约三四百吨,西瓜500余吨,柿子约400余吨,还有梨、李、枣、苹果、胡桃、红花、葡萄等大半运往汉口,运销汉口的蔬菜有白菜、萝卜、辣椒、豆粉等;禹州的甘草、薄荷等也从许昌车站运输。<sup>[17]123,126-127</sup>随着集散市场地位的形成,银钱业也随之兴起,城南大街、车站、南门里、各集市附近,都有钱摊。第三产业的形成,使许昌集散市场的功能越来越强。

随着铁路的延伸,一些县城的功能也发生转变,其市场地位凸显出来。陕县在清朝为直隶州,辖灵宝、阌乡、卢氏县,民国初改州为县。政治地位的降低,经济随之衰退,城内“居民稀少,隙地甚多”。但随着铁路延伸到陕县,这种局面得到了改观。“铁路通后,商务益盛,马路四达,昔日闭塞之邑,以变而为繁盛之都矣。陕西及灵宝诸县之棉花、牛羊皮均集散于此,尤以棉花为盛;税局收入之丰,为全省冠。”<sup>[17]97</sup>陕县成为豫西棉花和农副产的集散市场。

从市场的兴衰变化来看,河南的传统市场空间结构是以水运为枢纽形成的,如四大名镇周口镇、社旗镇、道口镇和朱仙镇,均位于水路交通方便之地。但随着铁路的兴起,物流方式的改变进而使商路发生了变化,在传统市场体系遭到致命打击的同时,新的市场格局开始建立。河南新市场体系以交通枢纽郑州为中心,以铁路为轴进行重新布局,平汉铁路沿线的中心市场有安阳、新乡、许昌、驻马店、漯河,陇海铁路沿线中心市场有商丘、开封、陕县等,道清铁路沿线有道口镇和清化镇。总之,随着铁路运输取代水运,以四大名镇为中枢的传统市场体系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铁路运输为枢纽的新市场体系的构建。

## 结 语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以战争和

不平等条约强迫开放通商口岸,使中国出现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对河南而言,真正发生“变局”是在平汉铁路开通与清末新政之后,开始有了近代化的气息。北洋政府时期不仅建立了新的经济制度,如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期间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在规范社会经济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还采取了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鼓励民间发展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这些因素给北洋政府时期河南经济带来了新的变化,农业方面,不仅种植结构在改变,农业的商品化程度也在提高。工业方面,1920年代河南70%以上的工矿企业都兴建于北洋政府时期,涉及工业门类在当时来说已经比较齐全,经营方式有企业集团、股份公司,也有中外合资企业。现代河南工业布局在北洋政府时期已有雏形。手工业方面,除了一些能够被机器工业品所能替代的行业外,大部分传统手工业还在延续,而且因出口贸易的需要,一些传统手工业如草帽辫、丝绸等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一些手工业转变为半机器生产,手工业经营方式也在改变。市场变化最为剧烈,以水运为纽带的传统市场比较迅速地瓦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以铁路运输为纽带的新市场体系的形成。这些种种变化,从一个侧面说明,北洋时期中国一些区域的社会经济是处于上升状态,而不完全是“沉沦”。

从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来,河南经济发生新的变化初显在晚清新政时期,在北洋政府时期迅速起步,奠定了现代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格局,因此,我们认为在近代河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北洋政府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 【参 考 文 献】

- [1] 刘世永,解学东.河南近代经济[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 [2] 张瑞德.平汉铁路与华北的经济发展(1905—1937)[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 [3] 沈松桥.经济作物与近代河南农村经济(1906—1937)[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经济史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 [4] 袁中金.河南近代铁路建设与经济发展[J].史学月刊,1993(4).
- [5] 吴俊范.近代中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1).
- [6] 方策,等.续安阳县志[M].1933年铅印本.
- [7] 白眉初.河南省志[M].1925年铅印本.
- [8] 陈铭鉴.西平县志[M].1934年刻本.
- [9] 虞和平.张謇与民国初年的农业现代化[J].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 [10]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2)[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11] 河南近年之植棉业[N].大公报,1920-11-11.
- [12] 河南省实业厅.河南全省棉业调查报告书[M].开封:河南官印局,1925.

- [13] 杞县开办美棉场[N].申报,1919-10-24.
- [1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1)[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5] 包书亮.英美烟公司对许昌烟市的垄断及烟行街的形成[J].许昌文史资料(7).
- [16] 明洁.英美烟公司和豫中农民[J].中国农村,1936(7).
- [17] 吴世勋.河南(下编)[M].北京:中华书局,1927.
- [18] 刘景向.河南新志[M].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标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 [19] 欧阳珍,韩嘉会.陕县志[M].1936年铅印本.
- [20] 林传甲.大中华河南地理志[M].北京:武学书馆,1920.
- [21] 车云修,王琴林.禹县志[M].1939年刻本.
- [22] 李峰.重修襄城县志[M].1936年刻本.
- [23] 刘继增.郑县烟草史话[J].郑县文史资料,1989(2).
- [24] 行政院新闻局.烟草产销[M].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1948.
- [25] 中美新闻社开封通信.河南之花生产[N].申报,1919-10-30.
- [26]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27] 纪彬.农村破产声中冀南一个繁荣的村庄[N].益世报,1935-8-17.
- [28]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 [29] 河南郑州之豫丰纱厂[J].实业杂志(总第33号),1920.
- [30] 张名金.郑州第二棉纺织厂[J].郑州文史资料(总第16期),1994(2).
- [31] 胡荣铨.中国煤矿[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 [32] 李福辰.河南省华新棉纺织厂的创建[J].卫辉文史资料,1991(3).
- [33] 本会统计室.全国棉纺织厂调查报告(二)[J].棉业月刊,1937(7).
- [34] 农商部布告第三号[N].政府公报(1164),1919-05-02.
- [35] 宏豫铁矿公司收股展期广告[N].政府公报(1069),1919-01-14.
- [36] 道清铁路管理局总务处文书课.道清铁路旅行指南[M].汉口:汉口光明印刷商店,1933.
- [37] 王先明,熊亚平.铁路与华北内陆新兴市镇的发展(1905—1937)[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3).
- [38] 韩邦孚,田芸生.新乡县续志[M],1923年刻本.
- [39] 张绍勋.许昌县志[M].1924年石印本.
- [40] 汝南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汝南县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 [41] 张镇芳,施景舜.项城县志[M].1914年石印本.
- [42] 靳蓉镜,王介.鄱陵县志[M].1936年铅印本.
- [43] 河南草帽辫出产尤多[N].(上海)国民日报,1919-08-15.
- [44] 卢以洽,张炘.续荥阳县志[M].1924年铅印本.
- [45] 徐家璘,杨凌阁.商水县志[M].1918年刻本.

- [46] 张镇芳. 施景舜. 项城县志[M]. 1914 年石印本.
- [47] 南召县史志编纂委员会. 南召县志[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
- [48] 节录. 南阳绸之现状与将来[J]. 地学杂志(9—10 合刊), 1919.
- [49] 任醇修. 河南柞蚕事业的过去[J]. 河南文史资料, 1985(2).
- [50] 刘月泉. 等. 重修正阳县志[M]. 1936 年铅印本.
- [51] 董纯熙. 近代洛阳商业漫谈[J]. 洛阳文史资料, 1987(2).
- [52] 晁凌音. 回忆“洋”字当头的时代[J]. 漯河文史资料, 1988(2).
- [53] 韩邦孚. 田芸生. 新乡县续志[M]. 1923 年刻本.
- [54] 方廷汉. 等. 重修信阳县志[M]. 1936 年铅印本.
- [55] 史延寿. 王士杰. 续武陟县志[M]. 1931 年刻本.
- [56] 田金祺. 赵东阶. 汜水县志[M]. 1928 年铅印本.
- [57] 杜鸿宾. 刘盼遂. 太康县志[M]. 1933 年铅印本.
- [58] 赵霖僧. 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及其意义[N]. 益世报, 1935-09-28.
- [59] 车云. 等. 禹县志[M]. 1937 年刊本.
- [60] 仵仲坚. 丝绸之市石佛寺[J]. 河南文史资料(总第 51 辑), 1994.
- [61] 许檀. 清代河南的商业重镇周口[J]. 中国史研究, 2003(1).
- [62] 许檀. 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J]. 史学月刊, 2005(6).
- [63] 戚震瀛. 开封名胜古迹志[J]. 地学杂志(总第 11 期), 1918.
- [64] 许檀. 清代河南赊旗镇的商业[J]. 历史研究, 2004(2).
- [65] 邱应欣. 社旗县志[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 [66] 浉池县志编纂委员会. 浉池县志[M]. 上海: 汉语大辞典出版社, 1991.
- [67] 张学厚. 郑州棉花业的兴衰[J]. 郑州文史资料(总第 5 辑), 1989.
- [68] 张相文. 豫游小识[J]. 地学杂志(总第 16 号), 1911.
- [69] 张炎卿. 郑州花行旧闻[J]. 河南文史资料(总第 44 辑), 1992.
- [70] 冯次行. 中国棉业论[M]. 上海: 北新书局, 1929.
- [71] 周志骅. 中国重要商品[M]. 上海: 华通书局, 1931.
- [72] 郑幼池. 郑州银钱业的一鳞半爪[J]. 郑州文史资料(总第 5 辑), 1989.
- [73] 杨达. 杨蕙兰. 民国时期郑州的银行机构[J]. 郑州文史资料(总第 13 辑), 1993.
- [74] 郑州金融机关[J]. 中央银行月报(第 2 卷第 11 号), 1933.
- [75] 本路带各地概略[J]. 铁路月刊(总第 8 期), 1930.
- [76] 张缙璜. 确山县志[M]. 1931 年铅印本.
- [77] 黄方聪. 清末民国时期漯河金融业简介[J]. 漯河文史资料(总第 5 辑), 1993.
- [78] 张福祥. 风雨春秋八十年——漯河市牛行街牲畜贸易市场见闻[J]. 漯河文史资料(总第 2 辑), 1988.
- [79] 董纯熙. 近代洛阳商业漫谈[J]. 洛阳文史资料(总第 2 辑), 1987.
- [80]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 中华民国四年第四次农商统计表[M]. 上海: 中华书局, 1917.
- [81] 洛阳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 洛阳市志[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 [82] 张绍勋. 许昌县志[M]. 1923 年石印本.

〔责任编辑 许正文〕

## Transitio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Changes in Henan Economy in the Rule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 ——A Focal Discussion on Industry, Agriculture and Urban Economy

HUANG Zheng-li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Shaanxi)

**Abstract:** In the rule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some new changes happened to Henan economy. In agriculture, owing to the change in plantation structure, the level of commercialization rose accordingly. In industry, 70% of Henan industrial and mining enterprises in the 1920's were set up in times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These enterprises involv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classific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time, including corporate groups, stock companies, and joint ventures, which already shaped the initial layout of modern industry in Henan. As for handicraft industry, some of traditional handicraft trades declined but most of them continued. Because of demand of exporting trade, a few traditional handicraft trades, such as straw-hat knitting, silk textile and whatever, gained considerable growth. Meanwhile, some handicraft industries turned to semi-mechanized production, which indicated a change in operating procedure of handicraft industry. Of all such changes, the greatest took place in marketplace. Water transport as the link to traditional marketplace collapsed rapidly, in whose place a new system of marketplace linked by railway transport took shape.

**Key Words:** government of the Northern Warlords; Henan economy; agriculture; industry; urban economy